

#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化政策的演进发展及内在逻辑

——以 1954-2024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为中心的分析

王可园 王倩玉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摘要:**文化政策是指导文化建设的基本策略和规范,对国家文化的建设和成效有重要影响。通过对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政策的演变和发展趋势。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对于文化政策的关注强度呈现“调整攀升-曲折起伏-U型波动-渐趋平缓”的阶段性特征。结合词频分析,可以进一步揭示不同阶段文化政策中的施政重心演变。中国文化政策的演进特点具体表现为文化建设的主题始终如一、内涵不断拓展、建设方略不断完善。全面回顾中国文化政策的发展历程和演进逻辑,总结中国在文化建设中获得的宝贵经验,对于新时代推进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文化政策;政策演进;文化建设;政府工作报告

**中图分类号:**C95 **Doi:**10.19898/j.cnki.42-1704/C.20241104.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24)11-0087-14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工作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推动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深刻体现了党在实践中对文化建设重要性认识的持续深化<sup>[1]</sup>。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sup>[2]</sup>这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政策作为指导文化建设的基本策

略和规范,对国家文化的建设和成效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化政策是指“国家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物博物等领域实行意识形态管理、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所采取的一整套制度性规定、规范、原则和要求体系的总称,是有别于教育政策、科技政策的一种政策形态”<sup>[3]</sup>。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化政策经历多次调整,不断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路径。从早期的思想文化建设到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国文化政策的变迁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应对和引领。因此,全面回顾中国文化政策

收稿日期:2024-03-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0&ZD01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中国共产党基层党建百年经验研究”(21JZD007)。

作者简介:王可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政党和国家治理。王倩玉,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的发展历程和演进逻辑,总结中国在文化建设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对于新时代推进中国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具有重要意义。

###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文化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引导文化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学界已有研究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1. 对文化政策演变总体趋势及其内在机理进行研究。研究者通过对文化政策的演变趋势、内在机理以及相关转变过程的深入分析,揭示了文化治理模式、治理对象和政策话语的变迁。谢秋山等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文化政策经历了从一元主导到多元和谐共存的发展过程<sup>[4]</sup>。雷杨等从话语变迁的角度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政策变迁,认为中国的文化政策经历了从国家话语向国家、经济、市民的整合话语的转变,反映了文化政策的经济属性和文化本身的人文属性相互激发的过程<sup>[5]</sup>。傅才武等通过对中国文化体制演进过程的分析,发现市场机制与政府自我调节互动机制是推动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转型的关键<sup>[6]</sup>。

2. 分阶段对不同时期的文化政策进行研究。在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十年文化建设的研究中,顾濛等提出,这段时间的文化政策经历了从斗争性到统一性的诉求变化,从文化策略到文化政策的理论转变,以及部分性到全面性的实践变化<sup>[7]</sup>。王铁钢则关注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1949-1965)间文化政策发展的曲折变化,揭示了当时社会背景下文化政策的各种挑战和调整<sup>[8]</sup>。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建设的研究中,郭远远等从文化建设的政策目标、功能定位、中央政策主导者的心理等角度,探究文化建设在国家现代化战略布局中地位的变化<sup>[9]</sup>。尹克寒以注意力理论为视角,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文化建设政策注意力的强度、议题及内容

演变<sup>[10]</sup>。

3. 分类别对不同领域的文化政策进行研究。主要涵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出版业发展、文化经济及文化产业政策等多个具体领域的政策演进。吴理财等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理念演进,从文化福利到文化权利再到文化治理,反映了政策在满足民众文化需求方面的不断完善<sup>[11]</sup>。王炎龙等探讨了新中国70年来出版业的发展态势,发现其多维主导的变革规律及以内容和消费为主的两大逻辑<sup>[12]</sup>。蔡尚伟考察了新中国文化经济与文化产业政策的演变过程,即从计划性管制到政府引导与市场调整相结合<sup>[13]</sup>。陈荣佳对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政策的特征、原因与得失进行了深入分析<sup>[14]</sup>。

学界对于我国文化政策变迁的研究,大多从宏观视角出发,结合具体历史事件进行梳理。虽然有部分研究聚焦于具体政策文本进行分析,但多以党代会报告作为文本数据,较少关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所体现的文化政策。实际上,党代会报告更多的是具有号召性和倡导性,而真正的落地则需要将党的方针政策转化为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府的公共政策。从这个角度来说,考察党代会报告关于文化建设相关论述的变迁只是第一步;更进一步,还需要考察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文化建设的具体政策部署。本文的目的,就是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为样本,分析我国文化政策的变迁及其逻辑。

###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分析了56份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数据,从中提取了与文化政策相关的议题作为研究的具体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于1954年发布了第一份正式政府工作报告,但由于某些原因,1961-1963年、1965-1974年以及1976-1977年未发布相应

报告。因此,本文分析了从 1954 年到 2024 年期间的 56 份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关注了其中与文化政策相关的内容。这些报告反映了政府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取向、调整以及对文化事业的支持程度。通过对这些文本数据的深入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我国文化政策的演变和发展趋势,为新时代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内容分析方法,旨在深入研究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文化政策的议题。内容分析法是一种通过系统分析文本内容以获取结论的研究方法,能够将政策内容转化为具体的数据信息,以获得较为客观的研究结果。首先,对 56 份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文化政策的章节标题和内容语句进行整理,通过统计文化政策相关议题在报告中的字数比例及其变化情况,分析政府对文化建设的关注程度及其阶段性变化。其次,利用 ROSTCM6 软件进行词频分析,以反映各阶段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文化政策的主

要关注方向,从而进一步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化政策的演进历程与特征。

### 三、文化政策所占政府施政比重演变

中国文化政策的发展是中国革命与建设、改革与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历史进程与逻辑的反映<sup>[15]</sup>。文化政策的调整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它不仅反映了国家战略目标和政策导向,也直接影响着社会文化生态的形成和发展。为了直观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对文化政策的关注强度及其变化,本文计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56 份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文化政策的文字数量占总字数的比重,变化过程如图 1 所示。由图 1 的 1954-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文化政策内容及篇幅比重可见,中央政府对于文化政策的关注度可将 1978 年、1992 年和 2012 年作为时间节点划分为四个时期,并呈现“调整攀升-曲折起伏-U 型波动-渐趋平缓”的阶段性特征。



图 1 1954-2024 年文化政策相关议题字数占政府工作报告总字数的比值及变化

1. 调整攀升阶段(1954-1977 年)。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政府工作报告中文化政策相关内容呈现出调整攀升的特点。这一时期,政府对文化政策的注意力投入和支持程度随着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而调整,文化政策的关注度大体经历了四个阶

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至 1956 年,政府着重于清理整顿旧文化、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建立社会主义文化新形态,政府对文化政策的关注度较高。第二阶段是 1957 年至 1960 年,因全党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扩大化等原因,党的文化政策偏

离了正常轨道,文化发展出现了波折,文化建设受挫,这一时期文化政策的文字数量占政府工作报告的总比重持续降低,到1958年降至最低谷。第三个阶段是1961年至1965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结束,文化事业的发展迎来了相对缓和的环境氛围,文化政策也逐渐回归其价值本位,政府对文化政策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第四个阶段是1966-1976年的“文革”时期,这一时期文化政策受到了巨大的干扰和破坏,但整体上政府仍保持着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度关注。

2. 曲折起伏阶段(1978-1991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果断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和政府的文化政策也逐渐走上正轨。这一时期,文化政策在国家话语和市场话语之间交织,经历了从以政治服务为主导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这一过渡时期的文化政策具有波动起伏的特征。一方面,政府仍然保持对文化领域的指导和管理,强调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传播和普及;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文化产业开始蓬勃发展,市场化的文化产品不断涌现。在此背景下,文化政策经历了波动起伏的阶段。政府在文化政策的调整 and 实践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境,如文化政策思想的先进性和文化管理方式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文化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间的平衡、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压力等。这些因素导致了政府对文化政策的关注度呈现出波动性和曲折性,既有高峰期,也有低谷期。

3. U型波动阶段(1992-2011年)。党的十四大后,中国进入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政府开始强调市场化和现代化建设,文化政策也相应发生变化,注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在这一时

期,政府对文化政策的关注度呈现出U型趋势的波动。1992年至21世纪初期,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促进经济增长、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成为政府的重要目标,政府将市场经济改革作为核心战略,文化政策逐渐被市场经济的浪潮所影响。相对而言,在政府资源和关注度上,文化发展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被视为辅助性社会资本,其主要作用是经济建设提供支撑<sup>[4]</sup>。因此,这一时期文化政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字数占比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然而,随着21世纪初文化产业的兴起和文化市场的扩大,政府开始重新关注文化领域,逐渐增加了对文化政策的投入和支持,使得文化政策的重要性再次上升。

2006年之后,中国的文化政策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政府对文化政策的重视程度整体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尤其是在2006年至2011年期间,政府对文化的关注和支持达到了一个高峰。200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2006年9月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制定的第一个专门规划五年期文化建设的纲要。这个纲要不仅是对我国文化发展进行长期规划的重要文件,也是对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指导性文件。相应地,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政策举措,如加强文化产业发展、推动文化市场繁荣、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等。

4. 渐趋平缓阶段(2012-2024年)。2012年之后,中央政府对文化政策的关注度出现下降趋势,但仍然保持在高位水平,2017年之后政府对文化政策的关注度逐步趋于稳定。

一方面,这是由于文化政策与文化体制改革在经过近二十年的调整与发展后,取得

显著成效。从 2002 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开始到 2012 年基本完成文化体制改革所部署的任务,重塑了大批合格的市场主体、不断探索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完成五大惠民工程的阶段性目标、加快了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因此,随着文化政策框架的完善和实施效果的显现,相对于其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文化政策的调整和优化可能不再需要大篇幅去详细叙述。

另一方面,国家对于文化政策的改革与部署已经从宏观层面转向更加微观的层面。例如,2014 年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发布的《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 2016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加强文化领域行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等都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政府更加侧重文化政策发展实践方面的界定,更多关注政策的效果评估和未来发展方向。这种政策重心的转移不仅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还反映了国家文化治理思路的转变。过去,中央政府在文化政策中占主导地位,制定了许多宏观性、框架性政策,但随着文化产业多元化和地方特色文化的兴起,地方政府在推进文化发展中的主体责任不断加大,中央政府的角色更多地向政策指导者和监督者转变,因此,在文化政策领域中央政府的关注度自然会相对降低。2017 年,《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文化政策进入了一个更加成熟和稳定的阶段。这两个规划文件的发布,为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具体的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政府对文化政策的关注度也进入了相对稳定的阶段。

#### 四、文化政策中的施政重心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文化政策不断

变化。通过上文对于文化政策所占政府施政比重的分析,可以大体了解中央政府对文化政策的关注度及其演变过程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每个时期的文化政策都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和特点。本文运用 ROST CM6 软件,抓取并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文化政策排行前 25 位的高频词(见下页表 1),参考图 1 并考虑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政策文件出台的时间节点,将 1949-2024 年文化政策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结合各阶段高频词具体分析我国文化政策的演进趋势与阶段特征。

1. 1949-1977 年:国家主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历了文化建设的全面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党和国家吸取了苏联文化僵化、专制的经验教训,继承并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顺利完成了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过渡。这一时期的文化政策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49 年至 1956 年,是文化政策转型和初创阶段。此时,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文化建设挑战。一方面,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愈发迫切;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当时我国的文盲率高达 80% 左右,这给文化建设带来了严峻的现实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党和国家改造旧文化教育体制,通过开展扫盲运动、建立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开设成人夜校等措施,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随着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政府开始注重思想意识形态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全社会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被普及并贯彻于各个领域。1957 年至 1960 年间,中国文化政策经历了充满波折的阶段。1956 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倡议之后,文化出现短暂的繁荣和发展。但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反右”运动的扩大化,党和国家的文化政策陷入了反复波折,文化发展受到阻碍。知识分

子政策发生了“左”的偏向,知识分子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失去了文化生产热情,文化批评和文艺争鸣变成了政治手段。1961年至1965年间,中国文化政策经历了从提高到急剧转变的阶段。1961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反思了国际和国内形势,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重新认识知识分子的价值和作用,深化“双百”方针,并探索文化发展规律,使社会主义文化再次繁荣起来。然而,这种文化政策提高的势头很快

被“左”倾思想所阻碍。政治运动逐渐升级,阶级斗争成为文化领域的主题,学术争鸣和批评被政治批判所代替。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导向最终演变为“文化大革命”,使整个社会陷入了混乱和动荡之中。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打击和损害,尤其是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化改造和建设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化政策呈现出以下特征。

表1 政府工作报告中文化政策阶段性词频统计(前25位)

1949-1977		1978-1991		1992-2011		2012-2024	
词语	频次	词语	频次	词语	频次	词语	频次
文化	96	文化	93	文化	163	文化	75
发展	33	发展	62	加强	70	发展	40
经济	31	教育	44	发展	68	加强	22
人民	25	经济	37	建设	61	保护	21
教育	24	科学	30	教育	43	教育	18
我国	24	文化事业	28	改革	37	推进	18
提高	20	人民	26	科技	35	传承	18
水平	15	体育	26	体育	34	建设	16
事业	14	提高	25	文化事业	31	文化事业	15
国家	14	卫生	25	卫生	31	文化产业	14
卫生	14	事业	21	文化建设	30	公共文化服务	14
物质生活	13	各项	20	事业	26	改革	12
政治	11	我国	17	文化体制	26	推动	12
文化教育事业	11	地区	16	经济	26	服务	12
文化教育	10	水平	16	交流	25	优秀传统文化	11
科学	9	科技	16	积极	25	文物	11
文化革命	9	政治	16	推进	22	弘扬	11
建设	9	经济文化	15	加快	20	体育	10
联系	8	思想文化	15	大力	20	深化	10
战线	8	社会主义	14	文化交流	19	旅游	10
必须	8	文化大革命	13	社会	19	非物质文化遗产	9
经济建设	7	科学文化	12	管理	19	繁荣	8
加强	7	领域	12	文化市场	18	促进	8
社会主义	7	艺术	12	文化产业	17	文化建设	8
部门	7	少数民族	12	促进	17	基层	8

一是国家政策话语主导,文化的政治属性强,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巩固。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内忧外患,中国共产党将文化视作改造思想、动员和团结民众的有效方式<sup>[16]</sup>。政府工作报告中频繁出现的“国家”“我国”“建设”“联系”“战线”“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等词汇(见表 1),反映了国家政策话语主导的思想引领和意识形态塑造。政府通过文化政策,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社会的传播和接受,强调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这种国家政策话语主导的文化政策,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的必然选择。首先,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要求文化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国家话语的主导有助于确保文化政策与国家发展战略相一致。其次,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混乱和挑战,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指导来推动全国一盘棋的文化建设。同时,政府希望通过塑造新的文化认同来加强国家的凝聚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政策的指导思想,与国家的意识形态高度一致。这种国家主导的文化建设,旨在塑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二是体现文化领导权观念,政府主导文化生产和传播。“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高频词汇体现了政府倡导的政治性文化。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采取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政治逻辑不仅影响着国家的宏观决策,也深刻地影响着文化事业的发展方向。这种以政治思想为导向的文化发展模式,使得民众参与文化活动往往处于一种被组织状态,在文化活动的形式、范围和时空等方面受到限制<sup>[11]</sup>。政府通过文化政策掌握对文化领域的管控权,对文化领域实行集中化管理。文化产业主要由国有企业和机构掌控,政府通过出版、广播、电影等媒体以及教育和宣传机构来传播社会主

义思想。文艺创作也受到严格限制,只有符合党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作品才能得到批准和发表。这种文化政策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文化领域的控制和引导,以确保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

2. 1978-1991 年:经济属性凸显与文化市场化探索。“文革”结束以后,政府着手重建受损的文化秩序。中国的文化政策经历了从以政治服务为主导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文化的政治属性为主到经济属性逐渐凸显,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逐步走向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过程。在 1978 年至 1986 年间,中国经历了“文革”后的积极调整与开放阶段。这一时期党对文化领域进行调整,并提倡“四个现代化”,开始着重关注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进一步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文化开放,放宽了对艺术、文学和学术领域的管控,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发展和文化创新。随后的 1987 年至 1992 年,中国的文化政策进一步强调了市场化和经济化方向。此时期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鼓励文化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推动文化产品的国际化输出、加强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等,为文化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保障。这一时期的变革,不仅是中国政治、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社会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阶段。在政治上,中国开始逐步摆脱过去的意识形态束缚,更加注重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在文化上,中国也在逐步向着开放、多元的方向发展,为后来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该阶段文化政策体现出下述特征。

一是国家话语和市场话语交织,从政治服务主导向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政治”“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等高频词,体现了在改革开放初期,文化政策一定程度上还受国家话语影响,需要解决“文革”时期的遗留

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对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要调整。放弃了过去长期以来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转而确定了“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方针,这一转变意味着对文化政策的重新思考和定位。一方面,尽管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具有阶级性的观点并未被放弃,但在新的指导思想下,这些观点不再被过分强调,而是被置于更深层次的理论支撑之下<sup>[17]</sup>。文化的阶级性被更多地理解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非单纯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文化的服务对象也得到了重新界定,不再仅限于政治需求,政府逐步认识到文化的经济属性,并开始将文化政策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以促进国家经济的繁荣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稳步推进。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的高频词如“发展”“经济”“科技”等,反映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重视。在这一时期,政府着力推动文化事业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以文化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

二是文化的经济属性逐渐凸显,促进文化市场化和产业化。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政府开始加速推进文化市场化和产业化进程。高频词如“文化事业”“艺术”“经济文化”等,反映了政府对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视。1985年,文化艺术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被列入国民生产统计的项目,标志着文化艺术的商品属性和产业属性被认可。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了“文化市场”的概念,在政策层面为文化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进一步加强了对文化市场的管理和规范。1991年,国务院批准的《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正式提出了“文化经济”这

一概念,明确了文化产业的属性属性和重要性。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在党的十四大上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也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三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发展。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意识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国家长治久安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开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通过推动文化教育和体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和体育水平。1979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概念提出,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突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成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高频词如“教育”“人民”“体育”“提高”“思想文化”等反映了政府对文化教育与体育事业的重视。在教育领域,政府加强了教育体制改革,完善了教育体系,提高了教育质量和普及率,加大了对学校和教育机构的资金支持。在体育方面,政府通过修建体育场馆、举办体育赛事、推广体育活动等举措,鼓励人民积极参与各类体育活动,提升国民的体育水平和身体素质。

3. 1992-2011年:市场主导下的文化管理体制变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也对文化领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同时,全球传媒革命和知识经济浪潮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1992年至2002年,中国文化政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文化体制改革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崛起和全球化的来临,政府感受到了文化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在此期间,政府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强对文化产业的引导和支持、推动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改善文化产业的营商环境等。这些举措推动了中国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2年至2012年是中国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關鍵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WTO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成员,这也意味着中国将更加积极地融入全球化进程。政府开始认识到,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增强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出越来越强的竞争力。文化产业的合法化和国际化竞争也成为当时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其中强调了党必须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时期,政府加大了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形成了覆盖全社会的完备体系,不仅在城市,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也开始初具规模,大量标志性的文化设施得以建成使用,为社会文化工作的全面展开提供了重要支撑。该阶段的文化政策体现出下述几个特征。

一是市场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文化的经济属性更为突出,文化产业成为重要经济支柱。这段时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内市场逐步开放。政府工作报告中不断强调“经济”“发展”“建设”等词语,体现了经济发展是当时的首要任务之一。此外,“文化市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等高频词凸显了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一阶段文化政策的重心逐渐向文化产业政策转移,强调促进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和市场化运作。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这标志着文化产业开始逐步成为政策的核心。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了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并将文化产业的合法化和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

高度。此后,文化产业不仅被纳入国民经济的整体规划,还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2009年国务院发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进一步提高了文化产业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文化产业发展也成为促进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动力。

二是文化管理体制不断深化改革,文化治理观念逐渐形成。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改革,文化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与之前由国家单一主导的文化管理模式不同,高频词如“管理”“市场”“文化体制”等,反映了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文化治理的主体更加多元化。政府不再对文化产业进行直接干预,部分文化职能逐渐移交给文化市场中的企业和经济组织,并激励它们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更多地采取引导和支持的方式,通过制定政策和法规,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199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经济的市场化进程。2005年发布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强调了改革文化体制的重要性,为后续文化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三是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促进国际文化交流。这一阶段中,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高频词如“交流”“合作”“国家”“软实力”等词语,反映了政府对文化软实力建设及文化交流的关注。2008年初,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性。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对内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能增强国家亲和力和影响力<sup>[18]</sup>。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必须更加积极地融入国际体系,以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冲击和竞争。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不仅是为了拓展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更是为了提升国家的软实力。2001年加入WTO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带来了

更多的机遇和挑战,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文化交流机制,中国不仅有机会向世界展示丰富的文化传统和创新成果,同时也能够从中吸取其他文化的精华,促进共同发展。这种开放的文化态度有助于构建更加和谐的国际文化关系,为中国的全球形象树立了积极的文化符号。

4. 2012-2024年:突出文化遗产与文化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从制造业为主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在此过程中,文化产业被视为经济转型中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之一。政府也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支持,促进了文化产业向数字化、网络化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面临着快速发展带来的城乡差距拉大等问题,政府希望通过文化建设提高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政策需要更多地关注社会稳定和价值观念的引导。此外,文化政策的调整也与国际化战略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经济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开始加大对外文化传播的力度,希望通过传播中国文化和价值观来树立国家形象、增强文化软实力。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文化建设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一目标的提出反映了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文化软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其中包括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了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上首次提出将文化安全与政治、经济安全并列,强调文化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明确将推动文化数字化发展列为国家战略,为文化政策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和重点。该阶段的文化政策体现出下述特征。

一是满足公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培育公民的文化参与能力。政府工作报告中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如“文化建设”“公共文化服务”“加强”“推进”“旅游”“健康”“基层”等,反映了政府在满足公民文化需求方面的积极努力。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多元化、高品质文化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加大投入,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升文化服务水平,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2015年,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有力保障。2016年,文化部进一步发布了《文化志愿服务管理办法》《文化馆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将顶层设计细化落地,通过制度化手段,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标准化、均等化和社会化,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和水平。2018年,国家进行了大部制机构改革,将文化部和旅游局合并为文化和旅游部,统筹管理文旅融合和文化建设,体现了政府对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视。此外,文化政策在培育公民参政能力、保护民主权利过程中,也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政府越来越注重听取公众的意见,促进公民的参与,使文化政策更贴近民生需求,更符合公民权益的实现。

二是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主流文化竞争力。政府工作报告中频繁提及“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关键词,反映了政府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高度重视。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更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因素。在快速现代化的背景下,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保持文化根基、弘扬

中华文化的重要手段<sup>[19]</sup>。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述,传统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支持项目,积极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标志着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和对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持续推动。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布,提出了加强文物保护与利用改革的重点任务和措施,推动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取得新进展。2019年,国家发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方案》,重点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了根脉的高度,赋予其前所未有的战略意义<sup>[20]</sup>。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国家认同,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形成积极向上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有助于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更好地展示中国自身的文化特色,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三是推动文化治理模式的转变和现代化进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文化政策呈现出多个显著特点,文化治理的现代化是其中之一。文化治理从过去的单一治理模式,逐步转向政府、市场和民间组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sup>[21]</sup>。高频词如“发展”“文化事业”“改革”“文化产业”“推动”等词,体现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文化治理也更加受到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这一新理念推动了文化治理模式的变革和现代化进

程。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政府开始减少对文化领域的行政干预,通过社会化的方式引导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2018年,国家文化部与国家旅游局合并为文化和旅游部,进一步统筹了文化与旅游资源,提升了文化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在文化治理方式方面,政府不断强化文化政策的科学性,加大了文化立法的步伐。政府与多元社会力量合作治理的基本趋向进一步强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得到完善,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同时,现代科技、金融手段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文化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持,激发了各方主体的文化创新能力和活力。

## 五、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化政策的演进特点

1. 文化建设的主题始终如一。文化建设的主题始终如一,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文化为人民服务。人民既是文化活动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更应是文化成果的享有者和评判者。文化建设必须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解放为最终价值旨归<sup>[22]</sup>。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将人民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将文化建设作为实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的重要途径,始终强调将文化服务于人民的理念贯穿于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政府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不断调整和完善文化政策,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 and 繁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文化教育普及运动,推动文盲扫除和建立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使更多的人民群众能够接受文化教育,提高自身素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政府开始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文化产品的创新和多样化,以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党和政府也进一步强化了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和管理,将文化服务于人民的理念贯穿于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在“文化共享”理念的引领下,党和政府加快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积极推动各项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加强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让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到了全体人民<sup>[23]</sup>。

2. 文化建设的内涵不断拓展。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文化政策的特点也不断演进和拓展,从意识形态建设向市场化、多元化转变,从单一的革命宣传向注重文化产业和软实力建设转变。这一演进过程既受到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息息相关,展现了中国文化建设多样性与活力。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政策主要集中于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社会主义建设,文化产业的发展相对较为落后。政府通过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加强对文化领域的管控,以确保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政权的稳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文化政策逐步从政治导向转变为市场导向,文化产业开始蓬勃发展。同时,政府开始重视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注意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通过鼓励市场竞争,推动文化产业的快速增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文化政策逐渐注重市场化、产业化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政府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通过鼓励创新和竞争,推动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国际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为中国的文化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逐步增强。中国文化政策更加注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强调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独

特地位。政府加大对本土文化的保护和挖掘力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为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注入新的动力。

3. 文化建设的方略不断完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文化政策不断演进,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国家的需要。在此过程中,涉及了多方面的改革与创新,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到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再到文化互动交流,都展现出了一系列特点和变化。

一是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大力投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修建了大量的博物馆、图书馆、剧院、美术馆等文化场馆,为人民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文化服务。新时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文化设施的需求也不断增长,政府在此方面的投入更是持续增加。除了传统的文化场馆建设,中国还在数字化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通过支持数字化图书馆、在线文化平台等项目的建设,不断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融合发展。

二是改革文化管理体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文化管理体制主要是以国家为主导,文化资源高度集中,文化生产与传播机构基本上由政府垄断,呈现出高度集中、行政化的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文化管理体制开始逐步转变。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启动了文化体制改革,逐步打破了原有的垄断格局,鼓励多种所有制形式参与文化产业,文化管理体制逐步向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方向转变。政府开始将一些文化事务交给社会力量、企事业单位或文化组织来承担,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来激发文化产业的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迈入了新的阶段,进一步推动了

顶层设计的优化和党政机构的整合,以深化大部制改革为基点,明确了文化管理的职能分工和职责范围,政府的角色从过去的直接干预者逐步向协调者和服务提供者转变。通过厘清政府文化职能、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推动文化企事业单位改革等方式,逐步实现了政府文化管理到文化治理思维的转变<sup>[24]</sup>。

三是加强文化互动交流。文化互动交流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促进国家间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文化合作。通过举办国际文化节和艺术展览、派遣文化交流团等方式,促进了中外文化的沟通与互鉴,提升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声誉。同时,也大力支持中国文化走出去,推动汉语国际推广、中国电影海外发行、中国文化产品输出等,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倡导不同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互鉴,强调要在交流中积极借鉴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sup>[25]</sup>。习近平文化思想更是倡导开放包容的全球文化交流与全球文化多样性发展,强调只有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才能实现文化的繁荣,才能使中华文明在与世界文明的交融中焕发新的活力<sup>[25]</sup>。

### 结语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竭动力<sup>[26]</sup>。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文化政策与文化治理始终处于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推动着文化建设的不断壮大和繁荣<sup>[27]</sup>。中国文化政策的演进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文化属性认识的发展与深入,从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到文化的经济属性,再到文化自身的价值属性,文化的多重属性得到更充分、均衡的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揭示了文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性,将文化建设与国家治理的新理念紧密结合在一起<sup>[28]</sup>。然而,在具体治理实践中,中国文化政策的实施效果与预期间尚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发展文化的精神价值属性,如何平衡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等等。因此,为实现文化“善治”,需要理顺党政文化管理权责、完善政府文化管理体制、规范文化市场秩序、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构建更加完善的文化治理体系。全面回顾中国文化政策的发展历程和演进逻辑,总结中国在文化建设中获得的宝贵经验,对于指导新时代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当继续坚持创新、开放、包容的文化发展理念,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提升文化治理能力,聚焦文化强国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 参考文献:

- [1] 方世南.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J]. 学术探索, 2024(1): 1-7.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3] 胡惠林. 文化政策学[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1-2.
- [4] 谢秋山, 陈世香. 我国文化政策的演变与前瞻[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4): 197-202.
- [5] 雷杨, 王琳慧. 新中国70年以来文化政策的演进浅析[J].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9(9): 16-24.
- [6] 傅才武, 秦然. 中国文化治理: 历史进程与演进逻辑[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11-22.
- [7] 顾濛, 李宁.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

- 文化建设的“三个转变”——基于1946-1956十年间的文化建设实践[J]. 理论导刊, 2018(4): 25-29.
- [8] 王铁钢. 建国十七年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及其演变研究(1949-1965)[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5.
- [9] 郭远远, 陈世香. 改革开放40年来文化建设定位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基于历年国务院政策文本的分析[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 127-135.
- [10] 尹克寒.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文化建设政策注意力演变——以党代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为中心的分析[J]. 图书馆论坛, 2023(6): 18-28.
- [11] 吴理财, 解胜利. 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40年: 理念演进、逻辑变迁、实践成效与发展方向[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9(5): 100-111.
- [12] 王炎龙, 李长鸿. 新中国70年出版业发展态势与运行逻辑[J]. 中国编辑, 2019(9): 15-20.
- [13] 蔡尚伟, 刘锐. 论新中国文化经济及文化产业政策的演变[J]. 思想战线, 2010(1): 113-117.
- [14] 陈荣佳. 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政策的历史演变与经验[J]. 厦门特区党校学报, 2020(6): 65-70.
- [15] 胡惠林. 新中国70年文化政策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基本特征[J]. 上海文化, 2019(12): 13-17+125.
- [16] 吴宁宁. “中国之治”的文化发展理路与实践自觉[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7): 132-137.
- [17] 杨凤城. 新中国60年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与方针、政策研究[J]. 教学与研究, 2009(10): 12-20.
- [18] 赵宇. 国家文化软实力[J]. 党的文献, 2012(1): 111.
- [19] 贾钢涛. 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核心要义[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1): 1-7.
- [20] 张洪松.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解读[J]. 社会科学辑刊, 2024(1): 1-7.
- [21] 蔡武进. 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70年: 历程和走向[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3): 25-35.
- [22] 韩美群, 刘江岩.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立场[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9): 25-32.
- [23] 于凌炜.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渊源、鲜明特征和核心要义[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1): 1-9.
- [24] 魏鹏举. 40年来文化管理体制的演变脉络[J]. 人民论坛, 2018(34): 38-39.
- [25] 令小雄, 袁健.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三个向度[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1): 1-14.
- [26] 范周, 侯雪彤, 宋立夫.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文化建设回顾与展望[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6): 172-184.
- [27] 胡惠林. 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历史逻辑与基本特征[J]. 治理研究, 2020(1): 43-49.
- [28] 孙成武, 吴玥.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创新[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1-7.

(责任编辑 程 苹)

to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all ethnic groups along this path but also to their collective efforts in advancing the cause of modernization.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ll ethnic groups along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mbodies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which asserts that “no one should be left behind”. It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equal distribution of the achievements of modernization to benefit all people. The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epresents the spirit of equal status and ownership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which is essential for collectively addressing risks and challenges while ensuring steady progress in building a strong nation and revitalizing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uphold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s a fundamental guarantee, implement the main line of ethnic work that emphasizes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build a shared sense of belonging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s the foundation. This will further enhance the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ethnic regions aligned with overall strategic initiatives, while ensuring that all ethnic groups advance together in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 shared sense of belonging for the Chinese nation

## **Evolution and Intrinsic Logic of China's Cultural Polici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 Analysis Focusing on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s of the State Council from 1954 to 2024**

WANG Ke-yuan, WANG Qian-yu

**Abstract:** Cultural policies serve as fundamental strategies and norms that guide cultural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influencing the direc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cultural growth. By analyzing the content of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s of the State Council,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and trends of China's cultural polici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government's attention to cultural policies has exhibited stage features of “adjustment and increase, fluctuating changes, U-shaped trend, and gradual stabilization”. Combined with a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we can further reveal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cy focu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cultural policies. The specific features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cultural policies include consistent themes in cultural development, expanding connotations, and an ever-improving approach to cultural strategi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cultural policies and their intrinsic logic can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pell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to new height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ultural policy; policy evolu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government work report

## **Breaking Boundaries and Making Breakthroughs of Duangong Dance in Northwestern Hubei in the Era of Integrated Media**

DU Peng

**Abstract:** Duangong dance in Northwestern Hubei, a cultural treasure of China that converges court and folk shamanistic traditions, vividly embodies the worship of nature, fertility, and totems by the early inhabitants of the Chu region through intricate hand gestures, dynamic dance movements, and ritualistic body language. Imbued with the unique charm of Chu culture, it stands as a valua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spiritual asset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has, on one hand, increasingly compressed the living space for Duangong dance; on the other h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in media have ushered in the era of integrated media, creating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Duangong dance. To achieve the breakthrough and expansion of Duangong dance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ree dimensions: cultural esse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cenario crea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a new paradigm for the dissemi-